出版史 文化周刊

鲁迅与陈寅恪——“民族魂”与“学人魂”

■刘经富

陈寅恪与鲁迅本无师友关系，但有些人用陈、鲁早年在日本的接触说事，1949年后陈寅恪从不透露他与鲁迅的早年交往，遂使陈、鲁关系成为一个话题。

按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陈寅恪的母舅俞明震受两江总督刘坤一委派，到日本视察学务，兼送陆师学堂毕业生22名、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学生6名到日本留学。陈寅恪长兄衡恪以文案身份携十二岁的老弟寅恪随行。二月十五日（阳历3月24号）从南京乘日本轮船大贞丸号前往日本，二月二十五（阳历4月4号）抵达日本横滨，行程十天。寅恪在船上与比他大九岁的鲁迅有接触当无疑义。四月初，兄弟俩即随俞明震返回南京。十一月，经俞明震的运作，衡恪终于获得江宁官费留学生名额，再次赴日。寅恪则仍在家塾里读书。因此衡恪、寅恪1902年2月的日本之行，只是利用母舅职务之便，到日本见见世面，为以后留日探路。至1904年，寅恪二兄隆恪考取官费留日，初冬，寅恪跟随二兄同赴日本，在某校跟班进修（关于1904年陈寅恪第二次赴日，陈寅恪本人晚年回忆说是与二兄隆恪一同考取官费留学，但亦有人披露寅恪其实是以“亲属滞在”理由赴日，日本外务省的签证时间是半年，并不准延期，故寅恪在当地的小学借读半年即回国），因长兄衡恪与鲁迅同在东京巢鸭弘文学院同学的关系或与鲁迅见过面，但据此认定陈寅恪与鲁迅为“同学故交”则属牵强。关于这一点，如署名散木的文章《陈寅恪与鲁迅有过“密切接触”么》（载《书品》2010年第3期），就质疑几种陈寅恪传记炒作陈、鲁早年关系。

1915年春，陈寅恪在北京曾担任过经界局局长蔡锷三个月左右的秘书，也可能在教育部做过欧文编审（见《北洋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里无陈寅恪薪俸记录，可能在教育部不足一个月），与鲁迅有过短暂交集。鲁迅1915年4月6日记：“赠陈寅恪《域外小说集》第一、二集，《炭画》各一册。”《炭画》一书是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中篇小说，由周作人翻译，出版事宜则由鲁迅联系张罗。1914年4月27日，鲁迅收到上海文明书局按出版协议送来的三十册《炭画》后，寄十册给弟周作人，其余二十册分别分赠友人。在寅恪1915年到北京之前，已赠送出十八册。1915年4月6日，这一天鲁迅将仅存的两册《炭画》赠给陈寅恪和齐寿山，也称得上有缘了。

虽然陈寅恪与鲁迅并没有同窗之谊（有鲁迅有同窗之谊的是陈衡恪，但1919年后两人已疏远了），交往也不深。鲁迅没有在公开发表的论著中提及陈寅恪，陈寅恪也没有提及鲁迅，但并不代表两人没有一点间接的心气精神上的联系。鲁迅曾经对陈寅恪好友吴宓嬉笑怒骂，对王国维也有批评，却对陈寅恪一直保持沉默。他们本来就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文人群体：一个要全盘西化，激烈地反传统，推行白话文；一个要“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持中国文化本位立场，传承文言文。1919年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时，胡适、陈独秀、鲁迅等高擎批判大旗，向家族制度和传统伦理道德开火。陈寅恪却对此大加肯定：“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见《吴宓日记》第二册，第102页）鲁迅对吴宓主编的《学衡》大张鞑伐，而对陈寅恪在《学衡》上发表过《与妹书》《王观堂先生挽辞》《与刘叔雅教授论国文考试题》的“古董”文章却很难得地一言不发（陈寅恪对吴宓办好这个刊物曾助过一臂之力。陈寅恪支持《学衡》，不仅是因为他与吴宓的个人友情深厚，更主要的是《学衡》的办刊宗旨与他的文化立场基本一致。该刊也确实发表了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在新旧嬗替时代，承传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并向海外传播）。鲁迅一生骂人无数，却对陈寅恪未有微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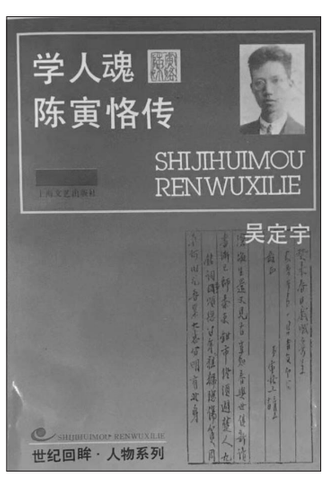
1949年后，鲁迅研究成为一门跨界于文学、历史与政治之间的“大学问”。他生前反对过和反对过他的人都争着“谬托知己”，陈寅格当然不会来凑这个热闹。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文化学术界掀起“陈寅恪热”，使陈寅恪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象征和代表。陈寅恪这一形象的弘扬和普及，很大程度上恢复了知识分子的自信，唤醒了他们的使命感——即为中国文化的复兴而不懈努力，并要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这一形象所蕴含的意义已经超出学术研究领域和知识界、文化界的范围，在一定意义上和“鲁迅”一样泛化为符号象征，与之俱来的是文化学术界的抑鲁扬陈或抑陈扬鲁（刘克敌《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载《中华读书报》，2019年10月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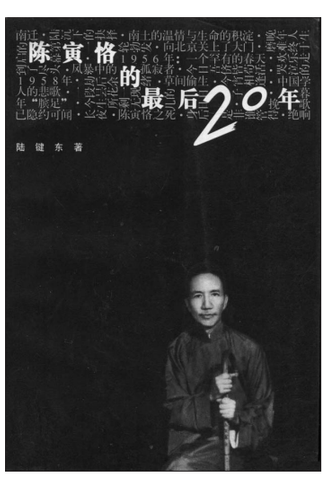
1996年，林贤治撰《文化遗民陈寅恪》一文，对陈寅恪被认定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不无微词，亦有人对林贤治此举不以为然，撰文申说：“针对林贤治此文，我要提出异议。我以为林先生过于执迷文化的新旧之分，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解过于狭隘，甚至可能从未深读陈寅恪的著作。评陈寅恪‘反背时势’、‘与时代隔绝’，称《柳如是别传》‘狎昵，庸俗，明显是一种没落的士大夫情调’等，隐约有道德批判的意思。不知林先生在此际所悬挂的评判标尺，是否以鲁迅为准星？若是，则不妨补充一点：知识人的风骨有多种，鲁迅嶙峋，陈寅恪坚韧，实质上却不分高下。”（王涛《旷代的忧伤——鲁迅与陈寅恪的风骨》，载《广州日报》，2009年11月16日）。

鲁迅和陈寅格，都在大师之列。鲁迅重在小说创作和杂文，但同时有汉文学史、小说史研究实绩在。陈寅恪重在史学，但对古典文学和文学批评理论也深有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文学卷·现代文学批评理论家》的排序是“鲁迅、陈寅恪、胡适”）。“大师”级的人物，不只“大”在一个方面、一个领域，而是从几个方面看去，都是一个稀有的大人物。王国维不只有《人间词话》，梁启超不只有《饮冰室诗话》。他们无一不是既有“作”，又有“论”，影响巨大，且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徐中玉《谈谈鲁迅、陈寅恪、茅盾》，载《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5期）。

在道德人格上，鲁迅对那些逢迎趋附、奴颜婢膝者予以辛辣嘲讽。陈寅恪对知识分子曲学阿世、插标卖首深恶痛绝。站在这个角度上，说鲁迅和陈寅恪为同道者是有理据的。论者谓二十世纪上半叶是鲁迅的时代，称之为“民族魂”，下半叶是陈寅恪的时代，称之为“学人魂”。

1996年8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已故吴定宇著《学人魂——陈寅恪传》。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众多弘扬陈寅恪的读物中，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吴定宇的《学人魂——陈寅恪传》对引发九十年代中期那一拨“陈寅恪热”功不可没，1996年因此被读书界称为“陈寅恪年”。《学人魂——陈寅恪传》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被评为1996年度上海文艺、文化、音乐出版社系统的十大优秀图书之一。作者凭借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对知识分子精神的叩问，再现了陈寅恪在社会动荡不安与文化机制的交替中，如何坚守自己的精神信念，勾勒出陈寅恪的心路历程与命运浮沉，抉示出陈寅恪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思想史上最本质的核心价值——学人之魂。至此，鲁、陈双峰并峙，二魂雄杰中华，对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来说，意义重大。





叶灵凤笔下的香港

■陈　缸

香港回归祖国已二十五周年，沧桑巨变令人感慨自豪，不觉怀念起当年居港爱国作家叶灵凤。叶灵凤虽以小说家盛名，然其散文、札记亦非常出色，尤在考证香港史迹、弘扬中华文化方面功绩卓著，给当年港英当局辖治下的香港文坛注入一股正气清流，堪称香港文史研究拓荒者。

叶灵凤（1905—1975），原名叶蕴璞，江苏南京人，就学于上海美专，1925年加入创造社，曾编辑《洪水》半月刊，1926年与潘汉年合办过《幻洲》，1928年《幻洲》被禁改出《戈壁》，是年底再遭禁又改出《现代小说》，1929年创造社被封，一度被捕。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参加夏衍主持的《救亡日报》工作，后随《救亡日报》迁广州，次年广州失守后去香港，从此定居香港，1975年病逝。

纵观叶灵凤笔谈香港，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末尤勤，文章多刊载于香港《星岛日报》《大公报》及《新晚报》。

1947年6月5日，在《星岛日报》开辟“香港史地”周刊，撰发刊词语：“不管你是喜欢还是憎恶，香港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而且值得研究的地方，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变动，是以香港为转捩点的。1840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代：中国上下从那时期开始对所谓列强有了新认识，而列强也开始对这个‘天朝’有了新的认识。香港恰恰就从这时在历史舞台上出现。”可是，“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我们可以说太缺乏注意了，更谈不上学术上的研究。过去对于香港这地方的一点自然史地研究成绩，可说都是外籍人士做的，正因为如此，已经有人走在前面了”，感叹之余饱含激励本土学者参与研究之志。

1947年6月至11月，在《星岛日报》“香港史地”专栏连载《西文香港史地书录解题》，共十七则。解题西文香港史地书录以莫林都尔夫的《中国书目提要》和亨利·柯尔狄尔的《中国关系书目》为主，此外尚增加一些其它书目。涉及书目涵《中国文库》《域多利威略述》《香港风景》《一八四六年香港年鉴及指南》《香港政府宪报摘要索引》《中国杂志》《香港名称》《山顶下》《香港、澳门、广州的鸟类》《中国日报的通商口岸》（香港部分）《纳米普斯号航程及作战史》《岭南》《科克的香港通信》《中国杂志?香港专号》《中国的欧罗巴》《鸦片快船》《香港植物志》。尽管叶氏在精心诠释书目后谦称“这只是一种初步的尝试工作，距离完备尚远，我希望以工作为基础，逐渐补充，以期能完成一篇比较整齐的研究香港史地关系的书目”，实际上其涵义远不止于此，终结了多年来由外人独步香港史研究资料的怪现象。

1953年，叶灵凤在《大公报》副刊开设“太平山方物志”专栏，撰写了一系列有关香港花鸟虫鱼和风俗的掌故，文章篇幅不长，笔法灵动有趣，深受读者喜爱，1956年结集成书，定名《香港方物志》，共计112篇，1958年香港中华书局初版，首印五千八百册。这部《香港方物志》既有别于专业的史志类典籍，也不同于纯粹的科普小品，而是将文史、科学、见闻以随笔形式糅合成散文，兼具抒情和书话，是一种带有叶氏个人风格的文体尝试。

1962年4月2日，在《新晚报》发表《日益消失的古老香港》，吐槽“近十几年以来，香港的面貌改变得很厉害，从海上望过来，平地和山上出现了许多大厦，一座紧贴着一座，一眼望去全是方格的窗口，简直是新式的鸽子笼，九龙方面也是这样”。“随着这些新建筑物的出现，许多古老优雅的房屋都被拆卸了，有些很美丽的角落，也被填平改造，辟作了建筑基地，不顾前后左右的形势，造起狭而高的高楼。”叶宅“卧房的后窗，本来仰望可以望见扯旗山顶。有时夜深睡得迟，下半夜的月亮会从山后面爬上来，照得山上的草木闪闪有光，令人看来有一种特别幽静的美感。可是现在呢，山腰悬崖之下早已出现了一排规模极大的高层，遮断了月光。现在抬起头来，所能见到的是一排排的窗口和骨骼似的露天楼梯，吟不成‘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了。”文人毕竟是文人，总眷恋着那份诗情画意。

1962年12月27日，在《新晚报》发表《丧失中的香港传统》，直言“目前的香港，在城市设计和管理方面，好像就缺乏了这样的理念。似乎忽视了过去，同时也不知道顾到将来，目光只是一味地注重眼前。仅就建筑设计来说，似乎只是着重简洁和单纯，完全忽略了美观和尊严。”稍后笔锋一转点赞“具有百年历史的木球会，他们能保存那一大片草地，不为利诱，给古老的香港保存了一点体面。”文末还特意加述：“前几年，也有人曾怀疑新中国会这样，说是准备拆了万里长城去造水库和工厂。后来有人游了八达岭，发现正在那里烧砖修补长城，这才知道谣言虽然有翅膀，却飞不过事实的界限。近几年的大力保护各地古迹文物，更证明了新中国也是在一面趋向现代化，一面注重保护旧有的优秀传统。”

1963年7月1日，在《新晚报》发表《香港之初期发展画册》，对香港亚细亚火油公司编印的包含1842年至1912年图片的《香港之初期发展》作公允的介绍和评议，在肯定其有益的同时也指出该画册数处图文舛误，并对封面所印由英国人绘制的第一幅香港岛最早的单幅地图予以匡正。

1963年12月2日—6日，在《新晚报》连载《读〈新安县志〉札记》，是月13日又追刊《万寿果与凤凰山读〈新安县志〉补志》，均以清嘉庆善本《新安县志》为参照，追溯香港历史沿革、隶属关系，全方位考证其地名、气候、风俗、物产、花卉等特色。补志尚语：“居县志所载，凤凰崖下还有一处名胜，称为望烟楼，是文天祥的子孙流寓之处，文家在邑内岁荒时就登楼眺望，凡人家无炊烟者就去加以救济，所以称为望烟楼。现在大埔还有文屋村，不知是不是他们的后人。”须得一提的是，叶灵凤生前系香港著名藏书家，拥卷宏富，格外珍视《新安县志》，拒外人收购，嘱将该籍奉献国家，他辞世后家属遵照遗愿献给广州中山图书馆，其余藏书悉捐香港中文大学。

1964年3月1日—3日，在《新晚报》发表《香港邮政邮票史话》，披露昔日之中国邮政与海关一样，皆由洋人把持，“从前在我国的那些通商口岸寄信来香港，或是往外国，要贴用的却不是中国邮票，而是香港邮票，香港邮票可以在香港以外，可以在我们内地也通用，这实在是邮政史上的‘珍闻’”。此类“珍闻”实乃民族之屈辱、主权之丧失，令人痛心疾首。作者在文中还借助霍金斯所著《香港和中国通商口岸的邮政史和邮戳》提供的史料叙述了“香港邮政本身，也有不少不寻常的历史。”

1964年7月8日—13日，在《新晚报》连载《黄尊宪的香港感怀诗》，考证黄尊宪曾四到香港，对黄氏《香港感怀十首》《到香港》及《自香港登舟感怀》诸诗进行了详尽笺注，鞭辟入里，颇具学术价值。

1965年12月5日—10日，在《新晚报》连载《有关张保仔的新资料》，根据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林则徐集》中“奏稿”部分里发掘涉及张保仔的相关资料，对张保仔等歹人进行了深入剖析。张保仔，曾为横行粤东沿海的海盗匪首，作恶多端，后被清廷招降委官，“林则徐是个正人君子，他对于盗匪是主剿不主抚的。因此两广总督百龄招抚郭婆带、张保仔后，他一直表示异议，对于张保仔投降后就成了清水师的官员，而且一再升任，很表示不满”，痛陈弊端，要求朝廷“对这个投降的海盗‘宣示裁抑’”。

1967年6月12日，在《新晚报》发表《调戏赤柱妇女被杀的英国军官》，回顾了1849年2月25日发生在香港赤柱黄麻角村的案件，那天薄暮时分，驻扎在赤柱的皇家工程营上尉科斯达和锡兰来福枪联队中尉达亚尔醉醺醺进村子挨家逐户寻欢找女人，在最末一户家中遇到一对夫妻和一个年轻媳妇，便对少妇动手动脚，公婆见状急忙阻止，不料两个英军兽性大发，用手杖猛击乱打，他们顿时血流满面，只好跑到门口高喊“救命”，四邻闻声相救，欲将歹徒拖至屋外，然英军继续撒野，激怒更大民愤，泊船附近的好汉徐亚保率领伙伴手执长矛赶来，歹人见势不妙夺门逃窜，被好汉追上戳倒，双双毙命。结果，“徐亚保仗义惩凶的壮举，使得赤柱人心大快。后来当局知道这两个英国军官咎由自取，也不敢为难黄麻角村民。圣约翰教堂的那块纪念碑尚所记的，就是者两人。其中科斯达的尸首后来在海上捞到了，达亚尔则一直没有下落。”

1967年，叶灵凤所著《香江旧事》一书由香港益群出版社出版，署名霜崖，是关于香港史地的书，收录《香港的“序曲”》《英国殖民者霸占香港经过》《九龙被侵占史话》等三十余篇，揭露英国殖民者侵占香港真相弘扬民族精神和气节。

1970年新春，叶灵凤撰《序新版〈香港方物志〉》，一吐当年初版不尽如己意之憾，称“自己当时为了尝试些这样以方物为题材的小品，曾经涉猎不少有关这方面的书籍，从方志、笔记、游记，以至外人所写的有关香港草木虫鱼的著作，来充实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在资料的引用和取舍方面都是有所根据，一点也不敢贸然下笔的”。“可惜初版书出版时，作者未曾有机会亲自校阅，本来应该附有若干插图的，也未及附入，这样倏忽之间已经跪了十多年，自己一直引以为歉，这次后改由上海书局再版，承他们给我改订的机会，将内容作修正和删改，并增加了一些新的材料，一边能配合时代的进展，同时更按照原定计划，附入若干插图，能矣新的面目与读者相见。”此次再版无疑了却了叶氏郁积多年的夙愿。是年，叶灵凤《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亦由香港上海书局出版。

诚然，将香港视作第二故乡的叶灵凤笔谈香港远不止以上胪列，但其字里行间充盈爱国爱港赤子之心殷殷可鉴。